

王

明

其

人



周国全 郭德宏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王明其人

周国全 郭德宏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97 号

王明其人

周国全 郭德宏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5.375印张 12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定价：3.50元

ISBN 7-5043-1953-8 K·24

小序

凡是议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难免提到王明。什么“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呀，等等。

然而，王明究竟是何许人也？也许不是人人都很清楚的。例如，他是怎样由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变成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的；他是怎样由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实际上掌握了中央领导权的；他是怎样向全党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他又怎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左”到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他后来又怎样坚持错误，并由坚持错误堕落到吹牛撒谎、制造谣言的地步的，等等。

弄清这些，不只是增加些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王明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对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于树立正确的组织观念、集体观念，对于做好工作和搞好自身修养，都是有好处的。正因为这样，本书就把王明的一生，作个简要的介绍。

本书是在我们与李明三同志合写的《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基础上改写的，除1956年以后的部分是新写的以外，其他部分也作了一些改动。

在本书付印前，佟英明同志帮助审阅了全稿，特此表示

致谢。

作 者

目 录

小序	(1)
青少年时代.....	(1)
在中山大学.....	(10)
鼓吹“左”倾与反对“立三路线”	(26)
上台前后	(37)
在共产国际.....	(57)
推行右倾投降主义	(86)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108)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18)
党的七大以后	(142)
在苏联的最后日子	(156)
几点教训	(163)

青 少 年 时 代

(一)

王明，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的一个小商人家里。

王明，本叫陈绍禹^①。他的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他的五辈祖父为逃避战争，迁到了金家寨。

金家寨在皖西山区，史河边上，地处安徽、河南的交界处，街首墙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人称金家寨是“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这里出产竹、木、铁、炭，自用有余，需要外销；但少粮无盐，需从外地运来。进出货物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大毛竹扎的竹排，在史河上运行。金家寨有一条中间高，两头低的“钱搭子”街，街两旁是小商店和住户。王明家就是小商店之一。

王明的父亲叫陈聘之。早年卖酱醋，攒了一点钱后，就和另外两家合伙开了个“陈龙昌”小店，经营竹木买卖。无

^① 王明一生用了许多名字。他的原名陈绍禹，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他的笔名有：韶玉（从1928年夏开始使用）、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1929年至1931年使用）、王明（1931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始用），等等。他还有一些化名，如泰山、风康、石、绍虞、WM等。另外，他还有一些俄语化名，如波波维奇、马马维奇、克劳白夫等。

田产，只靠小店惨淡经营维持生计，不富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下属的金家寨地区做过些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新疆做过经济工作。他曾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57年5月15日在北京病逝。

王明的母亲喻淑连，是家庭妇女。在鄂豫皖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在金家寨兴办了女子学校，担任校长，人称“文盲校长”。学校有男教员，流氓就借此造谣，并扬言闹事。她就持拐杖坐在校门口守候，使流氓不敢擅动。她于1930年病逝。

王明6岁入私塾读书，吟《三字经》、《百家姓》、《论语》、《诗经》等。他幼年比较聪明，8岁能写对联，9岁会写诗。因为他家是小本生意，常有拖欠、借贷的事，所以每到年关，总有人来讨账。他从8岁起，就同12岁的姐姐陈先民替父亲“挡账”。讨账人来了，他们就拿烟倒茶，说父亲出外借钱去了，几天没有回来，可能是没有借到钱，请年后再来吧。这种“挡账”的难堪滋味，使他深有感受。他在1919年的年关，就写了一首诗：

富户家家乐，
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
不再过年愁。^①

因为经济拮据，王明曾一度失学。等情况稍好，就于1920年秋到费用较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

① 《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1版，第22页。

(二)

“三农”，设在六安县城，是一所有革命气氛的学校。王明进校时，“五四”运动的春风已经吹到偏僻的皖西。“三农”的校长是老同盟会员沈子修。他聘用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等进步人士为教师，给学校带来了勃勃生机。从1919年到1924年，学校举行了许多政治活动。例如，响应“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大演革命文明戏，驱逐坏县长骆通，成立贫农夜校，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等等。开始时王明在这些斗争中，没有什么进步的表现。后来在“三农”革命气氛的熏陶下，萌生和发展了爱国思想。1921年，“三农”的老师和学生，自编自演了许多革命文明戏。其中有朝鲜亡国惨史话剧和印度亡国惨史哑剧。王明观看演出以后，深受教育，产生了报国图存的爱国主义意识。他曾写了一首题为《前覆后戒》的诗：

印度遭英灭， 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 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 帝强饿虎狰。
同胞快觉醒， 奋战以图存！ ①

王明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象棋下得不错，还会唱京戏。可他这个有京戏功底的人，却没有参加宣传和登台演出，反而作了一名“观众”，这说明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积极分子。但从他的诗看，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由一个渴求科学知识的

① 《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6页。

学生向一个爱国青年转变。

事实正是这样。到1922年，他就投身到了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当时，安徽第一中学的学生姜高琦，被军阀马联甲残酷枪杀了。军阀的残暴行径，激起了人民的愤慨。全省各校师生，纷纷罢课集会，游行示威。王明和“三农”师生一起，参加了这一斗争。他还写了《高琦不死》一诗：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①

王明的思想并不是直线发展的，中间也有曲折。1924年，学校开展了驱逐继任校长刘先黎的斗争。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对主张驱刘的进步学生开除了180余名，几乎占400名学生的一半，王明却站在保刘的一边。但这时王明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1924年春，他认识到组织进步团体的重要性，开始酝酿成立豫皖青年学会。

光阴荏苒。王明在“三农”的4年学生生活结束了。他揣着“三农”的毕业证书，于1924年暑假回到了家乡。这时，王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在家务农，还是继续升学念书？在家务农，可以把所学的农业知识用到实践上，可那又要困守在皖西山区，实在不甘心；升学吧，家庭经济状况又非常不好！怎么办？他把问题和想法提出来和父母商量。父亲说：“去年春初，桂四爷和汪四爷忽然合资领个行帖，叫旧地保张培材出面开行。谁都知道这是顶我家的生意，叫你今年不能升学。越是他们捣乱，不叫升学，我们就一定升学。”母亲也鼓励他升学，说“穷人要有硬骨头”。

① 《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7页。

他得到父母亲支持以后，就东借西讨，筹得一些钱。母亲也把多年积攒的私房七块大洋全部给了他。这样，他就带着少量的升学费用，于秋季开学前，赶到武汉，进入了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三)

他初到大城市，一切都感到新鲜：宽宽的马路，高高的大楼。他想尽快欣赏城市的风光，游览早已闻名的名胜古迹，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出校去走走看看。

开学不久，他就和同学詹禹生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共青团员梁仲明也参加了学会。相识不久的梁仲明，向王明讲述苏联十月革命，介绍苏联情况，还向他叙述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情况，给他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刊物。这一切，都是王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据王明自己说，他听了、看了之后，“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化”。他于1924年10月写了一首《喜闻道》的七律，以谢仲明：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列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①

王明得到梁仲明的帮助，思想上发生了明显地进步：由一个爱国青年，开始接触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自此，王明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活跃分子。他为豫皖青年学会写了会歌，

① 《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34页。

不仅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还有“创建新华，改造社会”的词句。他邀集进步同学一起访问大智门火车站，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他寒假回家，访问了农户，同情农民的痛苦生活，盼望“变天”，给农民带来“出头日”。

1925年开学不久，商科大学开展了一场驱逐屈氏校长的斗争。原来“屈氏长校，举校非之”，又发现他“吞没校款”，遂掀起驱屈的“革新运动”。屈氏并不示弱。他一方面收买无赖之徒，到处造谣，另一方面，“函厅电部”，向上面告状。然而“公理”在驱屈的一边，最后取得胜利。王明参加了这个斗争，并于4月29日写了《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一文，发表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文章说，从运动中得到三条经验：勿畏难；勿中止；有公理。“有畏难心，则不能举事，举事后，无坚持心，则不免因挫折而中止。……然而即不畏难不中止，使所事违反公理，则其失败量必与进攻力等也。”

王明还担任武昌商大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1925年5月1日，《皖光》第1卷第1期出版，其中发表了王明3篇文章。有一篇是《安徽的学生》。他首先分辨了什么是好学生、坏学生、偏废学生。认为读书兼从事社会活动的是好学生；只读书，或只从事社会活动的是偏废学生。他希望“使安徽的‘好学生’不要因为行政长官和学校办事人员拿什么‘整顿学风’的假面具来恐吓而畏缩，更不要因为一般无意识的人们拿什么‘捣乱分子’的绰号来批评而灰心；要兴奋精神，坚定志趣，避却受人利用的嫌疑，认清真理所在去做事；努力继续他们伟大神圣的工作，完成他们青年对于社会国家的使命”！另一篇文章是《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

校教育》。说现代学校费用过多，一般人负担不起，所以学校成了贵族的专利机关。对这种现象，要找出病根，治标治本。文章说：“中国贫困的原因，内由于军阀蹂躏和政治经济组织的不良，外由于受列强片面条约的约束，受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侵蚀”。因此，要免除贵族专制的现代学校教育，“必须改变现在国民的政治经济组织”，“必须先推翻了掌握现在经济政治实权的军阀”，“必须先打倒勾结军阀利用军阀为军阀护符的帝国主义者”。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有2000余名学生，到租界去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声援工人斗争，号召收回租界。有近百名学生被英警逮捕。下午，上海各界群众近万人集聚在关押被捕学生的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释放学生。英警又开枪打死10余人，伤多人，捕去53人。这个“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5月31日，湖北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青年联合会等公开团体的名义，召开会议。会议决定：6月1日武昌各大中学校开学生大会；实行罢课；各校选出2名代表准备出席武昌学生代表会议。6月1日晚9时，商科大学学生开会，多数师生都一致拥护罢课示威，但有个别教授和少数学生提出反对意见。王明立即发言，痛斥了这些人的谬论。接着，詹禹生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引起了绝大多数师生的共鸣。大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高呼“打倒汉奸”等口号，使这些反对罢课的人狼狈逃窜。大家选举王明和许鸿

作为商科大学的代表，出席即将在商大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

学生代表会议迅速召开了。各校都派来了代表。但师范大学却违反规定，派了8人，而且是国家主义派分子。会议开始后，师范大学的“代表”极力反对罢课罢市，还尽力捣乱会场，破坏会议的进行。王明和其他几位代表发言，对师大的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围绕在会场旁边的商大同学与各校代表一起，高呼“打倒汉奸”，“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致使师大来的人抱头鼠窜。会议决定全市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并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力声援上海的反帝运动。

6月2日，王明和武汉学生工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投靠帝国主义的武汉反动当局，惟恐事态扩大，就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下令各校提前放暑假。王明回到了金家寨。

到金家寨以后，王明等60余人在大王庙召开了豫皖青年学会第2次全体代表大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追悼上海、汉口、青岛、广州沙面的死难同胞，游行示威、演戏募捐。当时王明曾经写过一首诗，记述武汉学生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经过，最后两句是：“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①

在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中，王明非常活跃，被推选担任了“武昌学生联合会”的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并于9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

^① 七律《武汉青年反帝怒潮（六·二运动）》，《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0页。

由许凌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这年秋天，苏联为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这所大学，适应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形势，招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和国民党员。王明经过努力后，终于被批准赴莫斯科学习。临行前，他与詹禹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倾谈”，并于10月25日写了《赴莫前夕留别禹生》诗，述说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共勉继续努力。

11月2日，王明从武汉乘船赴上海。他登船以后，汽笛一声长鸣，离岸开航。他站在甲板上，百感交集，告别好友、告别母校的惜别心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齐涌上心头。他写了一首诗，记述当时的情况：

笛鸣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①

到上海以后，他根据组织的安排，住在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候开往苏联的船只。不几天，他就和蔡和森等50多人一起，登船先到海参崴，又改乘火车到莫斯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到达了设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汉克大街的中山大学。

① 《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5页。

在 中 山 大 学

(一)

王明到中山大学以后，取了个俄国名字，叫“克劳白夫”，被分配到第一班学习。

王明个子矮，不显眼，初来学校时不惹人注意。他开始给人们的印象是：“还用功，喜欢给学校墙报投稿”。有人说：出马一条枪，出名靠文章。王明常给墙报写文章，使他“初露头角”。

刚开学时，学生几乎都不懂俄语，教员都不懂汉语，又缺少翻译。语言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学进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加速培养翻译人员，还开办了一个用俄语直接听课的俄文班。从各班挑选了十来个学生，其中有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李培之、庄东晓，还有王明。

这个班具有“速成班”的性质。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和其他班不同。它只设四门课：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每门课都配备专门教师。教学方法是先由主讲教师定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书籍、参考书籍和有关辅助材料，再由教师在课堂上作个概括的简单引言，然后让学生自己读书，准备讨论。讨论结束时，由教师归纳作结论。在学习过程中，王明对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

界革命史的讨论，不感兴趣，很少发言，甚至紧闭双唇，一言不发。可是在讨论列宁主义课时，他一反常态，抢先发言。据他的同班同学庄东晓回忆，王明“经常是第一个首先发言，而且发言时紧张得两颊青筋暴露，口水四溅，以致坐在他侧边的同学（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顾”^①。王明对不同课程的不同表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人们在想：为什么他对其他课程那么冷淡，惟独对列宁主义课那么积极？日子一久，人们就察觉出来：他所以这样，是为了讨好主讲教师米夫。

米夫，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斯，1917年入党时，开始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这个姓名。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是拉狄克。拉狄克很少到校理事，学校的日常工作由米夫主持。米夫1901年8月3日出生，1925年开始任副校长时仅24岁。他没有多少实际斗争经验，更不了解中国情况。他讲授列宁主义课程，实际是讲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这一著作，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是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的。这就是说，斯大林的宣传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苏联人。而米夫照抄照搬斯大林的著作，不联系实际地向中国学生讲授，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就理论讲理论。

米夫教条主义地教，“王明教条主义地学。他死记硬背列宁主义课的名词术语，能够在讨论时滔滔不绝地讲一顿。这就博得了米夫的赏识。在讨论时同学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米

^① 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3期，第68页。